

《贵州新文学大系》总目录

引言 尹伯生

现代文学卷(上)、(下)

现代文学扫描

小 说 何积全

作品选(中篇节选 5 部,短篇 32 篇)

散 文 陈锐锋

作品选(104 篇)

诗 歌 陈锐锋何积全

作品选(88 首)

中长篇小说卷(上)、(下)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王鸿儒

——贵州当代中长篇小说论评

长篇小说列目(34 部)

长篇小说选介(11 部)

中篇小说选目(66 部)

中篇小说作品选(14 部)

短篇小说卷(上)、(下)

上编(1949—1978)

坎坷曲折的辛勤笔耕 何光渝 彭晓勇

作品选(21 篇)

下编(1979—1989)

走向现代的艰苦掘进 何光渝

作品选(28篇)

诗歌卷

重读来路 张 劲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作品选(278首) 朱吉成

儿童文学卷

从起步到繁荣 戴明贤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作品选(93篇、首)

散文卷

从平淡走向深沉 由单一趋于斑斓 艾筑生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作品选(散文47篇、杂文36篇、报告文学10篇)

文论卷

贵州新文学理论七十年 张建设 王良范

作品选(65篇)

史料卷

贵州新文学大事记(1919—1989) 鲁令子 井绪东

贵州文化、文学社团

贵州文化、文学期刊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小传

贵州作家创作书目

贵州新文学大系

中篇小说卷

(1949——1989)

王鸿儒 编撰

目 次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1)
——贵州当代中篇小说论评	
长篇小说列目·····	(46)
长篇小说选介目录·····	(48)
长篇小说选介·····	(49)
中篇小说选目·····	(56)
中篇小说选目录(上)·····	(59)
中篇小说作品选·····	(60)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贵州当代中篇小说论评

王鸿儒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并非仅仅是针对文学的时代精神及其社会内容而言的，这也同时指的是文学的体裁和形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这种外部特征给接受者留下的时代印象应该更其清晰而深刻。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我们在谈及或一时代的某种文学体裁之时，几乎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指称，由此可见某种文学体裁或形式的产生及发展，必然有着时代的根本因素，其繁荣的程度，也正体现着一个时期的文学水平。不用说，近世以来，在一切文学形式中，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大小，便是衡量一个时间文学创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别林斯基说：“长篇和中篇小说是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一类诗（指文学形式——引者），才能在这里感到无限的自由。其中结合了一切其他类别的诗：既有作者对所描写事件的感情的吐露——抒情诗，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其他类的诗所不能容忍的旁白、议论和教训，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都有其合法的地位。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正是鉴于中篇小说这些为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散文、戏剧、短篇小说等所无法代替的特征，他才对中篇小说创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长篇和中篇小说现在

居于其他一切类别的诗的首位；它们包括了一切艺术文学，以致任何其他作品和它们比较起来，都显得是稀见而偶然的東西了。”（《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研讨贵州当代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对中长篇小说四十年发展过程的回顾，无疑地能够比较充分地展示整个文学发展的轨迹及主要成绩，并且寻找出一些基本的规律，用以作为贵州文学走向未来的借鉴和参照。

一、初生与曲折：（1949—1965）

贵州地处僻远，历史上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中长篇小说创作中，也是如此。明清两代，贵州出过诗人、散文家、戏剧作家，唯独没有小说家。新文学的前三十年里，中国现代文坛曾经出现过茅盾、巴金、老舍那样的长篇小说巨匠，产生了诸如《子夜》、《家》、《春》、《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作品，从而构筑了新文学辉煌的殿堂；即使是诞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较为缓慢的中篇小说，也出现过鲁迅《阿Q正传》、柔石《二月》、巴金《海的梦》、《憩园》、茅盾《三人行》、沈从文《边城》以及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等不朽的名篇或有相当影响的作品。但是在贵州，长篇小说却是空白；三十年代，以乡土文学名世的作家蹇先艾，也仅创作过一部以抗战初期北平沦陷前后青年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古城儿女》。以此看来，贵州在建国之前，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实在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州解放，结束了剥削阶级统治这片高原的历史，党和政府领导着贵州各族人民走上了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需要选择容量较大的艺术形式。五十年代初期，短篇小说的创作虽已开始勃兴，却由于作家生活积累不足，艺术修养尚不充分，作家们投身于伟大的政治变革少

有空闲等原因,特别是经历了社会大变动后,需要一个时期的体验与思索,致使贵州作家仍然未能涉足中篇小说创作。但是,随着一支专业与业余作家队伍的逐步形成,新涌现的小说作家如石果、傅泽、微山、胡学文、苏晓星等,已经在小说创作中积累了相当经验,一九五六年,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双百”方针,贵州作家受到极大鼓舞,于是,中篇小说产生了,出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微山的《这也是战争》、胡学文的《芦笙节》、傅泽的《咽喉地带》以及苏晓星的《良心的中伤》等。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建国初期贵州山区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以及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揭示出肃反、抗美援朝或合作化运动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各种人物的心态、行为特征,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生活真实,有的作品还具有较高的美学品位。

胡学文的《芦笙节》是一部反映苗族青年男女在新社会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中篇小说。作品以朴实动人的笔调,写出青年布巴同阿吉如何破除姑表开亲的陋习,体现出青年一代移风易俗,力图掌握自身命运的时代特点。

作品尤能以细腻而富有诗意的笔触描写民族的风情,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作者也能提炼使用群众口语,从而使这部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乡土气息及民族特色。不足之处是后半部对于政治斗争的内容用笔过多,男女主人公爱情的主线难以发展,移风易俗的主题因而被淹没,布巴与其父告娄巴的矛盾的解决过于简单化,作品因之也减少了艺术的力量。

微山的中篇《这也是战争》初稿于一九五七年,一九五九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反映肃反斗争生活的中篇,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建国初期那场没有炮火硝烟的特殊的“战争”。

主要人物李子林形象的塑造,以及围绕着这个人物所展开的社会关系的描写,是这部中篇小说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李子林参

加革命多年,战争年代有过英雄的业绩,进城后却背上功臣包袱,以为自己是“凭了本事和功劳换来了今天的地位”,他终于在梅美的“美人计”前,堕入腐化的泥坑,竟至发展到要离异妻子,将梅美拉入党内。在他中了圈套之后,机密文件被窃,马场镇出现了闹粮事件……党的事业蒙受了损失。毫无疑问,李子林这类人物的产生,是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也是作者在生活中的发现。不足之处只在于,作家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没有能够揭示出李子林蜕变的心路历程,人物性格比较简单化,他的转变因之也显得突然和勉强。

《这也是战争》的长处还在于:作者在反映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时,并没有如一般侦破小说那样,对敌我双方的斗争作孤立、封闭式的描写,作者十分注意社会环境的展示,写出群众的觉悟及情绪,以此揭示肃反斗争的群众基础,衬托出党的领导者与公安人员所创造的英雄业绩,不足之处是财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苏澎及侦察员李长生的形象塑造得不够鲜明,性格比较单一、平面。

《咽喉地带》是傅泽反映志愿军战斗生活的一部中篇。傅泽解放初期曾参军入伍,随铁道兵部队赴朝鲜参战,所以他的小说多取材于部队生活。作品围绕着铁道兵某师在“咽喉地带”抢修铁路的事迹,成功地塑造了师长江超、团长梁其森、战士刘明成及护士长白宁等人的形象,是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这部作品十分注重环境的渲染和烘托,以便将他的主人公置于矛盾纠结的顶端,从而展示出铁道兵指战员的大智大勇。这部作品对于读者无疑具有一定的教育作用和审美的价值。

苏晓星的《良心的中伤》走的却是另一条审美路向。这位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彝族作家,将一个彝族农民车后复杂的性格心理作为他审视的焦点,由此展开生活的另一面,揭示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以及落后农民精神负载之厚重,在历史变革中举步之艰难。

可以说,在五十年代产生的贵州中篇小说创作中,胡学文

的《芦笙节》，微山的《这也是战争》和傅泽的《咽喉地带》使我们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最强音；而苏晓星的《良心的中伤》则使我们明白了贵州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在社会变革中，在人的心理层次上，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和烦难。而这种结合和互补，正表明贵州中篇小说创作，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当其初生之际，就已呈现出不可低估的实力。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贵州中篇创作的如下特点：

首先是比较突出的现实主义精神。不论是歌颂还是批评，作家们都能从现实生活出发，摄取自己熟悉的题材，对生活事实进行如实的、不想掩饰什么的描写。作家们的创作心态，是比较自由的。更其可贵的是，这些作品在追求真实性的基础上，都具有比较鲜明的倾向性，善善恶恶美美丑丑，该赞美的，赞美得热烈；该鞭笞的，鞭笞得有力。作家们都有一颗热爱新生活的爱心，能够感应时代的脉动，期望以作品参与新生活的创造，与人民一道推动历史的进程。这样，他们的作品均有比较强烈的功利教化意图，并且由于真诚、真实，确能产生引人向上的审美教育作用。应该说，这种现实主义是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延伸，但却渗入了革命的理想，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家，他们的人生理想与价值评价较少虚幻和矫情，所以他们笔下的英雄人物都具有平常人的性格特点，而落后人物也较少概念化的痕迹，因而与生活比较地切近。

其次，这些作品都能显示作家创作个性的追求，从中似可窥见那个时期的作家进行艺术探索的勇气。《咽喉地带》的结构和叙述方式极有特点。作家以师长江超指挥抢修的行动与其妻护士白宁照料伤员的经历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分而后合，构成一部复调小说，既多侧面地反映了战地生活，又在情节进展中通过切割使节奏的张弛获得了调剂，特别是通过白宁的所思所感，进一步打开了江超的精神世界，有助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小说的语言流畅而简炼、

叙述的短促、峻急，在形式上便渲染出战地的紧张气氛，不少地方可以见出作者白描的功力。而与苏晓星笔下的彝族生活适应，他的《良心的中伤》里则多有徐缓、悠长、复沓的调子，处处可以感受到彝族山区那种神秘的巫文化色彩和氛围，这与车后的愚昧、迷信恰相映衬。作家凭着对生活的忠诚，艺术构思的认真，开始走近了人物性格形成的更其深层的原因的揭示。

第三，在这个起步阶段，贵州中篇小说确也存在着若干不足。作品不多，题材也比较狭窄，与全国相比，不仅缺少如《开不败的花朵》（马加）、《活人塘》（陈登科）、《最后的报告》（峻青）那样的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也缺少如《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浪涛滚滚》（韶华）那样的反映工业建设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其他题材的作品更几乎无人问津，有的作家对中篇这种文体形式的写作不很熟悉，《这也是战争》便存在着时间跨度大，人物过多，头绪较繁的缺陷，因而不能集中笔力塑造主要人物。人物性格大都比较简单，象车后这样性格丰满、复杂的人物形象，更属凤毛麟角；反面人物亦有脸谱化的弊病。作家们往往写得过实，视野不宽，艺术的概括力不足，因而导致作品的内蕴不够丰富。尽管如此，建国初期的中篇小说作家在拓荒的过程中，让干部、农民和战士以及其他劳动者成了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尽力地记录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贵州山区留下的历史的回音，从而体现出文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特点。他们开辟蒿莱，功不可没。

但是，历史早已涌出了洪流，随着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再展开的“批判”和运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的恶果，贵州文艺界在批判一批作家作品之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旋即转入低潮，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反右倾”，使得大量粉饰现实，图解政策的各类平庸、虚夸之作充斥报刊，“左”倾文艺思潮，严重冲击着现实主义，作家们时时提心吊胆，陷入了极不正常的创作心态。六十年代初期，本来一些作家如傅泽、石果、胡学文、龙志毅等都在写作长

篇,这种心态使他们的长篇创作不能不一再难产,迟迟不能问世,中篇小说除了微山的《刘家山》外,几乎无可提谈之作。而这部作品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艺现象。

微山写于1964年年初的《刘家山》,明显地有着话本小说的影响,无论是小说的结构,主题的表达,人物性格的刻画,细节的选择,以及语言的锤炼等方面都比他的前期作品《这也是战争》有了新的变化,显示出作者在中篇小说创作中,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迈进的尝试和探索。

作品的不足在于作家对客观存在的某些反映,因缺少正确的评价而损害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应该承认,这是历史的局限。《刘家山》思想及其艺术之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和削弱,是“左”倾思潮导致的结果。作家们在政治及其文艺的低气压下,已经很难再从生活实际出发,努力挖掘生活的真理,《刘家山》后,贵州中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一蹶不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连这一点微弱的声音也再听不到了,经历了令人惋惜的曲折。

二、复苏到崛起(1977—1985)

贵州中长篇小说创作终于由低潮而归于寂灭。历史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时期,在文化专制主义的打击与控制之下,贵州小说创作队伍被彻底摧垮,整整十年之内,没有发表和出版过一部中长篇小说。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文坛上才开始恢复了一线生机。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破除了“四人帮”对文学的种种禁锢,文学创作由复苏走向崛起的时期终于到来。

这自然是指文学的整体而言。事实上,僻远的贵州文坛,较之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心省区,我们从一开始便慢了半拍。这是不必讳言的。1977年刘心武在北京发表了他的《班主任》,次年卢新华在上海发表了他的《伤痕》,以现实主义笔触剖析谢惠敏、宋宝琦们

精神上的创伤,控拆“血统论”,因而拉开了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序幕的时候,贵州小说还尚未发出这种激愤的、饱含血泪的声音。而较之短篇小说,贵州中长篇对于触及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创作思潮的反应,就更为滞后了。幸运的是,几位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体验过痛苦又有较长时期艺术准备的青年作家终于出现了,他们急起直追,投入并参与掀动了这股文学主潮,自1980年始,短短两年内,便有叶辛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蹉跎岁月》、《风凛冽》,王剑的《无果的花》、《秋夜,静静地……》、《望断归来路》以及黄放的《噩梦》等等出现。1982年3月,作协贵州分会召开了全省中篇小说创作会议,积极倡导和推动中篇小说创作,继而又建立了中篇小说创作办公室,负责审读并推荐发表和出版中篇小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收阅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32部,有效地促进了贵州中篇小说创作的发展,至是年十一月止,贵州作家即出版和发表了中篇小说19部,其中长篇3部,中篇16部,包括问世后即产生相当影响的何士光的《似水流年》、《草青青》,顾汶光、顾朴光的《天国恨》(第一卷),叶辛的《基石》,以及韦翰的《山外青山》,李起超的《巴巴塄风情》,伍略的《麻栗沟》,李宽定的《爱的价值》、《良家妇女》,雨煤的《召唤》、《乡土恋》等等。1982年,堪称为贵州中长篇创作复苏的一年。如是发展,至1985年止,更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渡魂》(顾汶光),《在醒来的土地上》、《拔河》、《初澜》(叶辛),《纵深地带》、《强者》(王剑)以及《九嶷烟尘》(戴明贤)等十余部,中篇小说近百部。从事中篇创作的作者,增加了余未人,卢惠龙、石定、赵剑平、戴绍康、王安、陈学书、金永福、石荔、司马赤、徐卫、许明桃、刘荣敏、弋良俊、陈茂荣、龙志毅、王文科、罗大胜、袁浪等数十人,崛起之势,令人感奋。

探讨这一时期贵州中篇小说特别是中篇小说从复苏到崛起的原因,是有意义的,首先是三中全会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作协贵州分会及时加强了中篇小说创作的引导、组织工作,《山花》、《文

娱世界》、《遵义文学》几家刊物都以一定篇幅刊载中篇，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又创办了着重发表中长篇的大型文艺刊物《创作》，这都是中长篇创作得以复苏的重要因素。但除了这些外部原因，中长篇小说有别于短篇小说及其它文学形式的独特结构容量及其审美属性，则是中长篇小说这一时期能够复苏并崛起于贵州文坛的内部因素。诚如前述，在别林斯基看来，中长篇小说在结构方面有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生活及其思想容量，“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尤其对于长篇说来，“它的容量，它的界限，是广阔无边的”；在审美属性方面，他则认为：“长篇小说里，生活是在人的里面，诸如人的心灵的秘密，人的灵魂，人的命运以及这命运和民族生活的一切关系等——这都构成长篇小说的丰富的主题”（《诗底分类和类型》），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亦即中长篇小说更适宜于充分地展示人的命运。谁都知道，与国内文坛相仿，贵州小说最先揭示“文革”灾难，喊出生存状态之荒诞与不幸的是张永龙的短篇《黑豆队长》，而敏锐地反映出农村经济改革恢复了农民人格尊严的则是何士光的短篇《乡场上》。如此迅捷地写出时代与人心的嬗变正是短篇小说之长，但是，短篇小说的容量所限，使作家们不足以借此抒写他们蓄积多年的人生体验和复杂情感，也无从在一个小小的横断面上写出主人公的整个命运。尤其是当文学思潮由“伤痕”转入“反思”阶段，作家们势不可避免地要将“文革”十年同前十七年联系起来，以探究“左”倾思潮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的教训。文学关注的重点，越来越明显地从社会问题进入对人的命运的关注，于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呈现出由点而线，由浮表而深层的特点，此种创作态势不能不促使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觉地选择中长篇小说，以便将他们对一个历史阶段乃至一个时代的人物命运的思考尽可能完整地熔铸其间。

这便产生了新时期贵州中长篇小说由复苏而至崛起的局面。

崛起中的贵州中长篇小说，首先把揭示“文革”的灾难和不幸

作为第一个流向。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迟缓了半拍的缘故,贵州中长篇作家进入“文革”题材之际,国内文学主潮早已从“伤痕”过渡到“反思”文学,所以纯粹写“伤痕”的作品极少,多是二者杂揉,在伤痕的揭示中引发反思,或通过反思去披露伤痕。最早写于79年9月的《无果的花》便是如此。

《无果的花》的作者王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有过参加红卫兵运动的经历,当过下乡知青。这部中篇有着作者不少真切感受,体现出作家对同时代人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与一般伤痕文学相同,作品首先着眼于揭露和控诉十年动乱使青年一代身心遭受摧残的悲剧。

作品围绕着梁若尘、肖莉华爱情的不幸,展开了与姚中明、石芳、王伯山及生产队长“老蔫儿”、会计“一片瓦”、采石场主任、公社老医生、同狱犯“丝瓜”等人际关系的描写,写出了知识青年们的分化和觉醒,从坎坷的经历中,他们终于明白:原来日思夜想的革命,不过是一场骗局。“这年辰什么都颠倒了,毁坏了,或者跟他们走,用黑心肝污染鲜红的旗;或者站起来,用斗争同他们较量,用沉默对他们反抗”。作品尽管还有笔力稚弱的不足,情节结构中人工斧凿的痕迹也比较明显,但对于“革命”历史的反映是真实的,并且开始触及了导致灾难的原因——现代迷信与极左思潮的结合。王剑稍后发表的《秋夜,静静地……》以及黄放的《噩梦》都带有这样的特点。

叶辛的小说又有不同。这位学生时代即从上海来到贵州农村插队的青年作家,“文革”后期即已开始中长篇创作,粉碎“四人帮”后,出版过《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峡谷烽烟》等描写儿童题材的作品,1979年后,作家转向知青生活的回顾与思索,同时代人的命运引起了他的深厚兴趣与表现的强烈欲望,写下了《山乡记事》、《带露的玫瑰》等中篇及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就以这三部长篇为代表,使他得以成为同代人的

代言人。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作为叶辛知青小说的发轫之作，具有明快、抒情的特点。作品并不着意于描写上海知青来到贵州农村后的艰苦乃至不幸，而是围绕着程旭、慕容支的爱情故事，展示出知识青年们的精神气质、理想情操、苦乐悲欢与追求奋进，从中描写了几类知青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出一代青年的多种风貌。

《风凛冽》则通过知青叶铭与高艳茹的爱情悲剧，从另一角度反映了一代青年的不幸遭遇。《蹉跎岁月》围绕着出身不好的柯碧舟同军干出身的女知青杜见春的爱情波折，不仅鞭挞了反动的“血统论”，更体现出作家对青年一代“于逆境中奋进，于痛苦中进击”的肯定和赞扬。这部作品除了后半部较为拖沓之外，以整体而言笔墨较为饱满，文气比较酣畅。叶辛自己据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经过导演的再创作，艺术质量明显提高，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叶辛的知青小说并不着意于日常生活、琐屑事件的再现，他总是把人物的命运同时代的风云联系起来，两相交织，发挥作家善于结构情节故事的长处，在迭起的风波中写出青年们的命运和变化。不论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写程旭在生产队里遭受的歧视打击，《风凛冽》写高艳茹被凌辱的不幸，《蹉跎岁月》写柯、杜的悲欢离合，都与十年浩劫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不仅揭示出知识青年不幸命运的时代根源，也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展示了特定时代及社会的风貌。他的小说尽管还有内蕴不丰，一些人物性格单一，生活容量不大，可读而不耐读的弱点，但他在反思“文革”生活的时候，更多地注目于青年们不甘沉沦的进取之心，所以他笔下的知青形象多具奋斗、拼搏精神，程旭、柯碧舟等都因家庭、爱情等遭受折磨和打击，身处逆境，却仍然奋发向上，将个人的不幸深埋心中，而将青春和智慧贡献给了有益于山区的事业，在奋斗中求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样，叶辛中长篇小说的反思已不再局限于一般地批判“血统论”，批

判极“左”思潮,而是在反思过程中包含了作者对积极人生的理解与推崇,对青年一代正确的幸福观及价值观的讴歌和肯定。

文学反思历史的这种特点,在知识分子题材的中篇小说中也十分突出。韦翰的《山外青山》,卢惠龙的《追随缪斯》,雨煤的《月光,淡淡的》,余未人的《回旋》、《轨迹》以及袁政谦的《月光》,王文科的《山鹰飞过河谷》等篇都是如此,这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生活在工矿,还是农村,也无论作家由他们的命运引发的整体还是局部的反思,这些人物莫不具有饱经忧患却不改初衷的优秀品质。《山外青山》中的医生卢复星,坦率、正直、热情、无私,视矿工为亲人,竭诚服务,以至为救护矿工而献身;妻子唐冰茹其始为了事业和爱情,舍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来到矿山,与卢复星结合,在丈夫死后,依然依恋着矿山。《追随缪斯》中的女画家尹琰,是那样忠实于艺术的追求,宁愿安守清贫,也不做金钱的奴婢。《回旋》中的季峰、秦晴,《轨迹》中的靳丛、安萍,《月亮,淡淡的》中的陶春、罗天亮,《月光》中的徐诚志,《山鹰飞过河谷》中的王图佳……这些知识分子形象没有一个不是带着心灵的创伤,在价值观念完全颠倒了的时代却忍辱负重,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及其罕见的拼搏精神去工作着,生活着。他们为社会作出了奉献,以此证明自身的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创造这批形象的中青年作家们,在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进行反思时,他们特别注重揭示出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而人格精神的发现和肯定,正是文学反思的重大收获之一。

有代表性的是何士光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及中篇《草青青》。这两部作品的初稿都写于“文革”中后期,较之他的《乡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人的发现及其对人的命运的思考,是要开始得更早的,并且更带有那个时代身陷苦闷的沉重色调。

《似水流年》围绕着为“漏网”女知青玉君寻找插队落户地点的事件,展开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升降浮沉的命运图景。“文革”在经

历了造反、串联、上山下乡，清队种种名目之后，经济已跌落到崩溃的边缘，造神运动无以复加，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猜忌和仇视，社会造出如钱永年、颜宗绪那样借革命以营私的虚伪丑恶灵魂；也以生存的危难和不幸，磨炼出叶家琪、高则生那样善良、诚恳、勇于行动的民族的希望。而玉君的男友谢仲连则是一个思想敏锐，面对社会的恶俗敢于抗争的知识分子。玉君在颜宗绪与谢仲连之间的情感倾斜显示出何士光对人的，也是他的道德的审美的价值尺度。颜宗绪这个人物是“左”倾思潮的产儿，作家对他的刻画相当接近生活的原色，他“遇事三思，长于检点，兢兢业业，没有一般年纪较轻的人们有的那种派头和劲头”，“一直像一架时钟那样，始终有规律地生活着”，他认为正当的只能是阶级友爱，而感情则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们的东西，所以他总要玉君“改造”自己，这使单纯而又有着家庭负累的玉君总是感到自己“平庸、糟糕”，甚至“连活着也不配”。谢仲连则对此表示了大胆的不满和怀疑，他劝玉君：“……你能相信是由于有了什么既定的目的，你才来到人世上的？人之入世，如风之不得不吹；人之出世，如水之不得不流！活着，不过就是还没有死”，这真是对颜宗绪那些高深的理论的大不恭了。他在引用了历史家的话之后又说：“活着不过是一场默默的生存的挣扎，命运的女神从来都是灰尘！深刻的道理算什么呢？不过愚弄他们罢了！……对了，如果按照颜宗绪认为，就得变成人们出生、赎罪、然后死亡。可是，我们有什么罪呢？谁有权利判定我们有罪呢？”玉君对他的话并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是她愿意和他在一起，“他了解人”！了解人，正是在这里，我们窥见了作家回顾与反思“文革”生活的起点。《草青青》则是一部带有感伤情绪的美丽的中篇。被不公平的日子“流放”到僻远乡村的中学教师孙孟陶，在与女友温幼瑜的恋情岌岌可危之际，善良、深情、纯洁的乡村少女小萍却走进了他的枯寂、平庸的生活，这使他感到温馨，“满心只是悦怡和激动，觉得人和人的日子依旧美好！”小萍最终是抵不住世俗强大

的压力，跟着一个军官走了，这缕温暖、平和的阳光，对于地位卑微的知识分子的消失，是特别能令人产生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方面的联想的。但是小萍在孙孟陶生活中一度的出现，确已使他能“怀着一种深爱来看待日子”，“尽管是一段苦难的日子，留给我们的也并非全是黯淡的东西”。透过对孙孟陶与小萍这段过往爱情的叙写，我们看到作家在那个试图使人性湮灭的历史环境中，如何坚执地固守着人之为人的营垒，为永恒的爱情唱出了一支美仑美奂的赞歌。这种反思的结果，既是具体而细微的，却也包容着时代与人生的宏旨，正如小说中的议论：爱情“更本质的使命，是牵引善良的人们相互靠近，彼此用一种更健全的情怀来看待人和人的日子，相信人和人的一切不会在苦难中泯灭，使人们生活得更有信心，步子也更坚实。”

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使贵州中长篇作家越来越注目于对极左错误的批判，他们一边抚慰着伤痕，一边审视过往的岁月，在摧残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历史状态的回顾中，作家强化了他们的人性意识，于是，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自省，成了这一时期贵州中长篇小说突出的主题。前述韦翰的《山外青山》其实就已相当动人地描写过人世间这种美好的情感，无论是老矿工舍命救护卢复星，还是卢复星为矿工而献身，也不论是郑宇中在卢复星死后对唐冰茹母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还是唐冰茹与卢复星生前，那一段相濡以沫的婚恋，都浸渍着出自人性的真挚、纯洁而高尚的感情。作家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和表现，诚如韦翰在这部作品的“后记”中所云：“它似乎是植根于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民族，生长于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又蕴蓄于普通人民心中的一种热能，这热能一如深埋地层的煤，外表朴拙，而当它一旦贡献出自己的时候，便喷射出令人目眩神摇的灿烂火花。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原来是我们所熟悉，并时常为之动容的，可惜，这些年来，它实在是久违了。”由此可见，作家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自省完全是自觉的。韦翰所